

附錄二／

## 馬來亞共產黨

——歷史、文獻與文學

潘婉明

自一九三〇年建黨算起，加上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探索階段及「南洋共產黨臨時委員會」(The 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ttee，簡稱「南洋臨委」)的草創時期，馬來亞共產黨至少有九十年的歷史可書。但截至二〇一三年為止，馬共尚未有黨史問世。究其原因，一曰沒有取得政權，二曰沒有共識。

這是事實，只是過於簡化。沒有執政無礙於歷史總結，馬共解除武裝已歷二十餘年，應該有足夠的時間盤點其歷史，卻沒有達成，想必有道不出的隱衷；沒有共識才是正解，但也不能就此稀釋化約了其中的歧異。一般認為，「肅反」和「分裂」是馬共鬥爭史上最大的爭議，兩造若不願鬆口或退一步促成和解，在取得歷史的默契和共識之前，任何黨史的產生，都不可能獲得雙方共同承認。此話不假，「肅反」和「分裂」確實是馬共歷史總結的罩門，但我認為，馬共黨史的延宕，有比這一點更複雜更糾結的因素，也有比分裂兩方更多方的歧見。

馬共無黨史，但並非無史。馬共在其各個歷史階段，都曾經就黨的成立及其進程做出交代。早年或限於條件，相關文獻的內容極簡，篇幅也不長，但可見出馬共重視歷史的態度，有其傳統。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們近幾年彙編史料的努力和出版文獻的數量得到證實。下文即以馬共的成立和發展起頭，首先說明馬共的歷史背景，指出其移動與跨域的本質，同時也分析幾份堪可代表黨史的重要文件／獻；繼而列舉馬共本身所生產及出版的文獻，略述其內容與性質；最後以兩位馬共作家——金枝、賀巾其人及其作品為例，簡單的介紹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遊走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特質。

本文乃應黃錦樹老師之邀，從書寫中的論文及已發表的文章中擷取不同章節剪裁而成的。錦樹老師好以「馬共」為題創作，作品多到可以集結成兩書。他說台灣讀者對馬共歷史沒有背景，來訊問我有沒有文章可供他收作附錄。我想不只台灣讀者，新馬及其他區域的讀者也未必有相關認識。錦樹老師所書寫的「馬共」，雖不無「惡搞」，卻有其文學與歷史宏旨。就學術的意義，他的策略不一定能成，但也不失為一種累積和嘗試，煞費苦心。我的文章硬澀，跟他玩得很「high」的小說放在一起頗不協調，但我還是很樂意趕在他排版之前剪裁本篇，為他的苦心出一點力。

## 一、馬來亞共產黨史：移動與跨域

### (一) 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現場

馬來亞共產黨的歷史現場不限於一時一地。自一九三〇年成立至一九八九年其總書記陳平與馬泰

兩國政府簽訂和平協議止，共歷時五十九年。但馬共歷史的發端可能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九年《益群報》創刊以來的整個一九二〇年代。這份報紙雖由國民黨人創辦，但歷任編輯都具有無政府共產主義(anarcho-communism)的政治背景，因此學者楊進發(C. F. Yong)認為，這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在馬來亞奠下了共產主義某些觀點和理論基礎，他們比第一波到此宣揚共產主義思想的中共黨員起碼要早了三年<sup>1</sup>。此說挑戰了一般所認為的共產主義乃由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黨左翼份子或印尼共產黨引進馬來亞。不過這同時也說明了馬來亞的共產主義政治的發展從來都不能跟中共脫勾，時間甚至可以更往前推。

第一批中國共產黨員是一九二一年潛入馬來亞活動，影響力可及於報界、民間學校和工人團體。共產主義思想和組織在馬來亞的拓展，跟中國的政局一直發生聯動。一九二四年的聯俄容共政策加速了在馬來亞活動的共產黨人滲入國民黨的組織，而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分裂也促使在馬來亞的共產黨人必須從當地的國民黨組織中脫離出來，另覓容身之處。一九二八年初成立的「南洋臨委」是馬共的前身，由中共派出五名代理人籌組而成，管轄除菲律賓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活動<sup>2</sup>。一九三

<sup>1</sup> 楊進發，〈五四運動與馬來亞華人——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興起（一九一九—一九二五）〉，《新馬華族領導層的初探》（新加坡：青年書局，二〇〇七），頁二〇九—三六。

<sup>2</sup> 楊進發，〈早期馬來亞歷史激進派運動領導層——南洋臨時委員會（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個案〉，《新馬華族領導層的初探》，頁二六〇。

○年四月<sup>3</sup>，「南洋臨委」在第三國際指示下宣布解散，並以馬來亞共產黨取而代之。這意味著東南亞的共產運動進入了去集權化和地方分立的發展階段<sup>4</sup>。

馬共成立之初，活動主力在工人／工會鬥爭，影響面不廣，普遍認為只及於海南籍群體，期間也經歷過幾次內部的派系衝突和分裂。但自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戰以來，馬共領袖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凝聚之下，積極發動抗日援華運動，並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中常委會議中，將「援助中國自衛戰爭，不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搬運、開礦、割膠，抵制日貨，募捐及組織慰勞隊和國際義勇軍，積極援助中華民族驅逐日本出中國……」列為鬥爭綱領之一，且主張懲辦法西斯侵略者的奸細，沒收其財產充作反侵略的經費。<sup>5</sup>

當時，以陳嘉庚為首的南洋僑領已發動僑界，先後成立「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委員會」（簡稱「籌賑會」）和「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號召華僑踴躍捐輸，救濟傷兵難民，支持祖國抗戰。由於殖民地總督要求捐款一概匯交南京中央政府行政院收，馬共於是另外成立了「馬來亞華僑各界抗敵後援會」（簡稱「抗援」），以依附在「籌賑會」的半公開形式進行募捐，所得款項祕密匯到香港交廖承志辦公室，以支援八路軍、新四軍、東江抗日游擊隊、瓊崖抗日獨立隊等中共所領導的部隊。此外，「抗援」也配合「南僑總會」發動其會員參加回國服務的機工隊<sup>6</sup>。

「抗援」的行動邏輯基本上延續了「南洋臨委」及其後繼者馬共的尚武、激進精神。除了賣花、募捐、義演、義賣、獻金、徵召機工回國服務這類一般性工作，「抗援」還暗中擔負了其他任務，如懲戒漢奸、抵制日貨、糾察會場等等，堅決和各種破壞抗日救國運動的勢力進行鬥爭。由於手段激烈，致使無數在此間活動的共產黨人被殖民政府逮捕驅逐，加上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以後，馬共一度採取更激進的反帝策略，鼓勵勞資對立和發動罷工示威，無視殖民政府的強勢鎮壓，直到中共在一九四〇年中下旬出手干預方休。<sup>8</sup>到這裡，我們已經很清楚了解，馬共和中共一直維繫著非常緊密的、從屬的、指導的關係。其黨員雖以本地群眾為對象，但領導層源自於中共指派的知識份子。馬共的歷史從一開始就有跨越遊走在不同地域的性質。

3 一般指馬共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地點在森美蘭的瓜拉比勞（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不過楊進發則主張它於四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柔佛的巫浮加什（Buloh Kasap, Johor）成立。見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 Society, 1997), pp. 129-31。

4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p. 131-34。

5 〈馬來亞共產黨十大鬥爭綱領〉（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一九三八年四月），收入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戰前地下鬥爭時期（二）——反法西斯、援華抗日階段》（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一〇），頁一一。

6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新版）（上）》（新加坡：八方，一九九三），頁五八—六〇。

7 相關資料見陳青山，〈馬來亞「抗援會」與華僑抗日運動〉，收入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香港：見證，一九九二），頁三二—二五；馬林，〈「抗敵後援會」在馬華抗日救國運動中的歷史作用〉，收入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頁三二—五—四一。

8 楊進發，〈馬來亞共產黨領導層、思想與組織的研究（一九三六—一九四一）〉，《新馬華族領導層的初探》，頁三一八—一九。

一九四一年杪，馬來亞的天空戰雲密布，「抗戰」已非「國內」之事。盛傳日軍將登陸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遂將兵力集中在馬來亞最南端的小島上。其時英軍對迎戰日本頗有自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取道泰國南部進入英屬馬來亞境地的吉蘭丹（Kelantan），接著揮軍南下，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攻佔北馬各州直抵雪蘭莪（Selangor）。英軍兵敗如山倒，失去了馬來亞的半壁江山。十二月二十日，政府釋放全馬各地被關押的約二百名馬共黨員和抗日份子，並同意讓共產黨派員到「一〇一特別訓練學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接受游擊戰訓練，開始跟過去的宿敵聯手對抗新的侵略者。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淪陷，全馬失守，但馬共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就已做出反應，在雪蘭莪州成立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 Anti Japanese Army，簡稱「抗日軍」）的第一獨立隊，其他各州也跟進，先後成立獨立隊。馬共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保衛馬來亞，「抗日軍」成爲此間最有規模的軍事力量。

戰後，殖民政府因馬共「抗日有功」而承認其合法地位，允其公開活動。但這段表面和諧共存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很久。一九四七年，馬共因揭發其總書記萊特（Lai Teck）爲法、英、日三面間諜而經歷了一場內部風暴，年僅二十三歲的陳平繼任爲總書記，並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召開的第九次擴大的中央會議通過改以武裝鬥爭爲「最主要和最高的鬥爭形式」<sup>10</sup>。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英國殖民政府在全馬頒布緊急狀態（Emergency），正式展開一場長達數十年的惡鬥。馬共組成「馬來亞民族解放軍」（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簡稱「解放軍」），挖出抗日時期預藏的武器，召集黨員參加游擊戰鬥。英國殖民者集合帝國資源強勢剿共，馬共在各方面條件懸殊的情況下處於下風。

從一九五〇年始，殖民地政府雷厲風行推動「新村計畫」（Briggs Plan），在全馬各地建立數百個「新村」（New Villages），把原來散居在鄉村和森林邊緣的華人民眾圈禁其中，通過一種集中營管理方式，封鎖和控制了糧食、物資、情報和人口的流動，成功地將馬共和其（潛在的）支持者隔離開來。

「新村計畫」對馬共打擊甚深，各地部隊開始面對飢餓的局面。一九五三年始，「解放軍」陸續向北撤退到馬泰邊境，駐紮在泰國南部的勿洞（Betong）、昔羅（Sadao）等地區。其時有部份不及北撤而被遺下的部隊，困守在檳城浮羅山背（Balik Pulau）、霹靂州（Perak）、馬六甲（Melaka）和柔佛州北部（Northern Johor）的森林裡。這些成了孤軍的隊伍，有者奮戰到底，部份出去投敵，個別戰士則偷渡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和其他外海的島嶼，另謀出路。

「解放軍」的主力撤退到馬泰邊境後，糧困的問題暫且緩解，但隨即面對另一個尷尬的局面：當戰場不在境內，鬥爭目標不明，士氣受影響，兵員招募也有困難。一九五五年底，馬共主動發表結束武裝鬥爭聲明，要求與馬來亞聯盟政府會談。然而即將赴英談判獨立地位的政府代表團態度強硬，以致「華玲會議」（Baling Talk）破局，馬共堅決以「不投降」為前提持續鬥爭。一九五七年馬來亞取

<sup>9</sup> 羅武，《馬來亞的反抗（一九四二—一九四五）》（香港：海泉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一一八、四七。

<sup>10</sup> 陳田，《馬來亞共產黨史料（一九三〇—一九六二）》，收入林雁等編，《陳田紀念文集》（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二〇〇八），頁二二三—二四。

得獨立，政府以強勢的「剿共」姿態拒絕再與馬共進行和談，而馬共也拒絕承認「主權不完整」的獨立，雙方都錯過和解的歷史時機。

馬來亞獨立令馬共的處境愈發艱難，遂於一九五九年指示縮減人員，降低游擊活動級別，檢討前景，逐漸停止武裝鬥爭，其主要領導人則於一九六〇年底啟程前往中國「作客」。然而不到兩年時間，中共總書記鄧小平於一九六一年中接見馬共領導層時表示東南亞的形勢大好，促馬共恢復武裝。馬共遂於一九六二年推翻原「偃旗息鼓」政策，執行「新方針」路線。

在「新方針」的指示下，馬共自一九六九年始先後派遣7支突擊隊南下，並成功跟國內的地下組織接頭，遂於一九七一年在霹靂州成立「第五突擊隊」（5突），一九七三年在彭亨州擴大組成「第六突擊隊」（6突）。兩支隊伍的任務是要在馬境內恢復「解放軍」北撤前在該兩州的地盤，但5突面對嚴峻的圍剿，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宣告瓦解，所幸有相當人數的戰士成功折返邊區，而6突則堅持到一九八八年才非常戲劇性地被「招降」，為馬共歷史留下懸念。

在中國，馬共高層經由中共安排，落戶在湖南省四方山。中共以代號「691」軍事基地為掩飾，同意馬共開設廣播電台。一九六九年底，「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正式運作，以三語廣播（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語）向東南亞地區放送消息。一九八〇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到訪中國，中共隨即要求馬共於一九八一年中關閉「革命之聲」電台。馬共遂將電台設備轉移到邊區，改設「馬來亞民主之聲」，繼續廣播。

在新加坡，由於政治和地理條件的限制，馬共的活動採取地下路線，通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

(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簡稱「抗英同盟」)等組織對工會、學校和農村進行滲透。一九五四年，李光耀與一批左翼菁英共同籌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行動黨)，以反對黨之姿崛起，並於一九五九年贏得自治邦議會大選。一九六一年行動黨發生內部份裂，黨內的左翼人士脫黨另組社會主義陣線(Berisalan Sosialis Singapura，簡稱社陣)。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行動黨政府大肆逮捕一百一十名左翼人士，包括社陣黨人、工會領袖、地下組織成員及共產黨員，是為「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 Store)<sup>11</sup>。事實上，在大逮捕行動之前，馬共考慮到保全幹部之必要，分批把地下成員撤到印尼，其中部份人員被派往蘇門答臘的漁村，伺機打通海路，偷渡返馬。這支來自新加坡的流亡隊伍，在印尼展開長期的流亡生涯，一直至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才開始思考何去何從<sup>12</sup>。期間有的成員在潛返新馬執行任務時被捕，另一部份人則經由組織安排前往中國，或潛伏在港澳接應陸

<sup>11</sup> 相關研究及逮捕名單詳見·Geoff Wade, "Operation Cold Store": A Key Event in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in 21<sup>st</sup>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IAHA), 22-25 June, Singapore.

<sup>12</sup> 張泰永，〈地下航線解密——半個多世紀前活躍於印尼與新加坡之間的一條地下航線〉，收入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深埋心中的秘密：新加坡與檳榔嶼的故事》(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〇八)，頁一六一—一〇六；陳劍主編，《浪尖逐夢：余柱業口述歷史檔案》(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二〇〇六)；賀巾，《流亡》(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二〇一一)。

續到來的同志；有一些人脫離組織下落不明，還有一些人滯留在印尼終老。成功到達中國者，可能被留下來為馬共電台服務，等待機會回到馬泰邊區上隊。一些在中國出生或成長的馬共第二代成員，學成後也會被派往邊區貢獻他們的力量。

馬新兩地，無論是殖民時期或後來的自治／獨立時期的執政者，反共立場都非常堅定，對共產黨人絕不寬待。在緊急法令之下，不少馬共黨員、被俘的游擊戰士、輸送物資的民運人員或疑是共黨同情者的一般群眾被收押在監，若被捕時持有武器將可被判死刑。這些人被判刑後關押在全馬各地的扣留營，有的人審訊後被驅逐出境，另一些人則在被拘押數年至十數年後，甚至將近刑期屆滿時才被驅逐，有些家屬也因此陪同出境。他們抵達中國後，大部份被中國政府安置在海南、廣東、福建各省的「華僑農場」拓墾，從此入籍中國，其中也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由馬共變成中共。這些人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國宣布有條件的華僑可申請出國的政策後，陸續移居香港，取得港籍並持英國護照，少部份人則到了澳門。

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來西亞及泰國政府簽訂和平協議，正式解除武裝。一九九一年馬來西亞政府開放回國申請時，約有四百名邊區的戰士選擇返馬定居。這批解甲歸國的戰士回國迄今滿二十載，在生活中的適應和發展可自成一體歷史階段。在新加坡出生的馬共成員，則必須簽署一分政治聲明才能入境。大多數來自新加坡的馬共不願為此否定自己一生的信念，拒絕回歸而入籍泰國，並選擇定居在泰國政府為安置他們而建設的幾個和平新村裡。

從上述簡介可知，馬共歷史是一部不斷在移動和跨境的歷史，無論在人員的穿越或地理疆域的跨越上。馬共最初的成立和組織，皆由中共派員指導，其後的發展也深受中國民族主義及中國國內局勢的影響。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無法在中國立足的中共南下馬來亞變身為馬共，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無法立足馬來亞的馬共回歸中國後變成中共，此為人員的移動與穿越。在疆域上，馬共的鬥爭跨出了本土的界線，且跨越多個不同的地域。馬共雖為本土而戰，最後卻只有小部份人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其餘大多數人都置身域外<sup>13</sup>。

## (二) 史前史：類黨史的重要文件

馬共黨史遲遲未修訖，跟它的疆域跨度太大，導致彼此互看不見有關。但就我的理解，馬共並不是一直處於「無史」的狀態。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中，距日本投降尚不足半年，馬共就出版了言論集《南島之春》，裡面收入的《馬來亞共產黨史略》（以下簡稱《史略》），估計是馬共有史以來的第一篇黨史<sup>14</sup>。它是一篇名副其實的「史略」，篇幅不足七頁，極其簡短，除了交代馬共成立的大略及戰前的國際形勢，其他大部份內容乃幾次代表大會的綱領和目標。該《史略》自一九二五年說起，至一九四六年止，剛好滿二十年。對於一個尚在摸索、又經歷戰事的黨而言，二十年時間或許夠不上一篇滿

13 潘婉明，〈在地·跨境·身體移動·知識傳播——馬來亞共產黨史的再思考〉，《華人研究國際學報》三卷二期（二〇一一年），頁五七—七二。

14 《南島之春》（新加坡：馬來亞出版社，一九四六），頁八一—四。

載功業的黨史，但作為最早出版的類黨史文獻，〈史略〉的內容稍嫌薄弱，乏善可陳。

馬共的第二篇黨史很可能是一九六二年由中央委員陳田所撰的一篇未命名的文件。一九六〇年底，為尋求中共支持其撤兵計畫，馬共中央決定調派陳平、李安東及陳田三人北上中國。<sup>15</sup> 陳田當時可能沒有意料到，他此去不再復返，終老中國。初到北京，陳田即著手整理、撰寫黨史資料，並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寫就一篇以「庄聲」署名的手稿，不過內容只交代馬共自創立以來到一九五九年的發展。陳田後半生的歲月都流亡在中國，但直至一九九〇年去世為止，他都沒有再續寫下去，因此這份文件一直停留在「手稿」的狀態，且沒有訂題。後來它被收入在《陳田紀念文集》，才由編者題名為〈馬來亞共產黨史料〉（以下簡稱〈史料〉）<sup>16</sup>。

〈史料〉的內容主要以大事紀的形式安排，按時序陳述，尤其著重歷次中央擴大會議及其他各次重大會議的召開，並一一記錄每次會議通過的決議、綱領、主張、宣言、任務、決定或意見，中間也安插他對那些影響馬共決策和方針的國際動向所做的分析。陳田的敘述相當有條理，思想正統。〈史料〉從馬來亞遭受殖民開始談起，開宗明義指馬共的誕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陳田把馬共鬥爭放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來理解，因此全文諸多針對黨的錯誤所進行的檢討，最後都歸結出「對馬列主義的鬥爭策略掌握不夠」、「對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夠」的結論。整體而言，陳田的文字清晰，心思細密，言論端正，但也可見出他的個性略帶保守、注重瑣屑。〈史料〉雖然在措詞方面頗為含蓄、內斂，卻不失坦率。陳田對馬共在一九五〇年代初露敗象的記述跳躍得很快，但他沒有迴避，坦承投敵者眾，「處境空前困難」，以致「現在，除了

小股隊伍活動之外，中、南馬一帶的部隊可以說已經崩潰了」<sup>17</sup>。

陳田之後，馬共最重要的黨史文獻當數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距那份未命名的「手稿」四十年後，陳平回憶錄的英文版首先在二〇〇三年出版，次年翻譯成中文，備受矚目。《我方的歷史》雖然以回憶錄形式成書，但它既是「最高領導」的現身說法，即被各界視為某種權威的代言，可用以檢驗馬共的歷史。陳平似乎也有意扮演這種角色，因為他要說的是「我方」的歷史而非「我」的。

然而，當陳平試圖用全視的角度敘述他未參與的情節，「我方」和「我」之間不自覺地出現了角力和推卸。細讀文本，我們大致可以將《我方的歷史》分為三個部份，首先是自我背景介紹，說明他個人的成長及其走向共產主義的經過。此佔篇幅極短，約二十頁；其次是在馬來亞參加革命期間（一九四〇—一九六一）的種種，依順序敘述：加入馬共、參與抗日、地下活動、游擊戰鬥、負責136聯繫、退伍復員、黨內鬥爭、追查叛徒、發動武裝、建立根據地失利、新村打擊、伏擊欽差、撤退邊區、華玲會談、遣散部隊、北撤中國等等。這其中有許多事他都沒有親歷其境，但他對自己赴華

15 陳平口述，伊恩·沃德（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ior）譯，《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新加坡：Media Masters Pre. Ltd.，二〇〇四），頁三六八—七〇。

16 陳田，〈馬來亞共產黨史料（一九三〇—一九六二）〉，頁八二—一三八。

17 同前註，頁一二六—一二七。

之前所發生的馬共歷史的重大事件，都一一評論作為交代，包括在和豐 (Sungai Siput) 擊斃英籍園丘經理、攻佔話望生 (Gua Musang) 警察局宣布建立解放區、英軍濫殺峇冬加里 (Batang Kali) 平民事件、李明從被判死刑到獲得特赦的傳奇等。這個部份的篇幅極長，共佔三百餘頁；最後是流亡中國期間 (一九六二—一九八九) 的種種及和平協議的簽訂，內容包含馬共政策由「偃旗息鼓」轉變為「新方針」的經過、在湖南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兩次肅反引起的中央分裂、「革命之聲」停播後由泰南發送的「民主之聲」替代、合艾和平協議的催生與實現、解除武裝後的人員安排與安置等等。這個部份的篇幅中等，不足百頁。

從以上的簡述可知，陳平回憶錄的三大部份比例明顯不均。他以五分之三強的篇幅敘述二十一年的經歷，卻以不足五分之一的篇幅交代另外二十七年的歷史。他做這樣的分配並不令人意外，大致可以理解為他長年駐外，既未掌控部隊也未大權在握，而馬共的鬥爭在中後期也無大作為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陳平的敘事都不斷地在「我方」與「我」之間發生角色跳躍。《我方的歷史》前面的部份，陳平習慣用「我的」來說明他的地位及展現他的信心，如我的軍隊 (my army)、我的人 (my man)、我的司令員 (my military commander)、我的政治事務官 (my political affairs officer)、我的副手 (my deputy) 甚至是我的游擊隊 (my guerrillas)。可是越到後面，特別是在華期間，他越多使用「我們」，越發加深他代表「我方」發言的意味，雖然在語氣上逐漸顯得氣弱。每當檢討過去馬共鬥爭所犯下的各種錯誤時，他又開始將「我」和其他「大多數意見」(majority opinion) 進行切割，稱異於「我」的其他人為「他們」。在黨的重大決策上，陳平甚至多次表示「我

只好少數服從多數」(I fell in line)、「我保持中立」(I took a neutral stand / I remained neutral) 或「我無能為力」(nothing I could do)。<sup>8</sup>

縱觀《我方的歷史》全文，陳平的敘事中有一貫的「我」，卻沒有一致的「我方」。「我」在知情的範圍內總是洋溢著熱情與自信、年輕而堅定、在摸索中行動、敢於提出批判，有適時承擔責任也承認失誤的一面。然「我方」卻不是一個集體，而是視戰略的對錯、決策的成敗、責任或責難的輕重等後見之明，由「我」、「我們」或「他們」自由重組。「我」與「我方」的交錯與跳躍，固然出於陳平對個人隱私和馬共歷史有所掩飾，但究其原因，乃因為總書記不在場之故。換句話說，這是讓缺席者來填寫歷史現場。事實上，《我方的歷史》作為類黨史文獻的有效性及意義不大，因為傳記原就是承載個人意志的文體。但《我方的歷史》因有英文版，成為西方世界能閱讀的少數馬共文本之一，遂令它比其他馬共文獻擔當了更多的關注和批評。

## 二、文獻：敘而未論的整理與彙編

和平協議簽訂距今已逾二十年，馬共黨史的生產確有延宕，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對於本黨歷史的保存不感焦慮。馬共的出版機構二十一世紀出版社自成立以來，積極編纂各類系列叢書，試圖透過自我

<sup>8</sup> Peng Chin, *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2003), pp. 9, 19, 72, 108, 433, 444, 466, 474.



發聲來抗衡殖民者及國家長久以來的片面演繹。該出版社據稱由馬共基金注資，由二十一世紀聯誼會的核心幹部擔任編輯，其立場亦代表著以北馬局／陳平為首的馬共中央的「主流」及「正統」。他們有一系列的出版計畫，有其時間表及議程，按照既定的框架詮釋這場革命鬥爭史。

自二〇一〇年始，馬共陸續推出的《馬共文集》系列，將黨史各個階段的文件依分期<sup>19</sup>彙編成冊，其中包括馬共最早的出版品《南島之春》內的篇章、黨的章程、各次擴大會議的決議、鬥爭綱領、主張、通告、廣播稿、學習材料等等。截至目前（二〇一三年七月）為止，《馬共文集》已有七輯付梓。第一輯整理了建黨初期的背景和主要領袖的簡歷；第二輯收入了反法西斯、援華時期的重要文件；第三輯則是抗日時期的黨軍文件，不過內容取自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印的《馬來亞革命資料（第三輯）》；第四和第五輯介紹日據時期馬來亞抗日軍的歷史，但內容剪輯自早前已出版的馬共各領袖的回憶錄，重複性很高；第六和第七輯則整理了戰後和平時期有關抗日軍復員及自治獨立運動方面的文件。

《馬共文集》的安排非常紊亂，它並不是純粹的文獻彙編，當中有許多內容是資料搜索和剪貼的結果，各輯中還附錄了相當篇幅的學者論文。我們不難理解它所以如此的原因，多年的戰鬥和流徙造成許多文獻佚失，而保存下來的也未必集合一處。編者坦言，《馬共文集》的整理和編輯工作並不簡單，「不是『有求必應』、垂手可得的」<sup>20</sup>。總的來說，這些文獻距類黨史的性質甚遠，但它們卻是未來黨史生產過程中至為重要的參考及引用材料。無序何嘗不是一種秩序，紊亂有時比井然能透露更多訊息，研讀它的意義正在於此。

此外，二十一世紀出版社也積極出版其他書籍，包括《馬泰邊區風雲錄系列》（四輯）、《歲月留痕叢書系列》（五輯）、《探索之旅叢書系列》、個別領導及戰士回憶錄、小說、畫冊等等。馬共出版品的質素不齊，但《十年叢書系列》（五輯）的出版卻異常珍貴。一九五八年，馬共為紀念「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十周年」，在部隊出版了一系列共十四輯的《十年》叢書。這批文獻經過將近一甲子的戰火歲月，有十三輯保存下來，只有一輯從缺，今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集結重新出版。

除了二十一世紀以外，坊間還有其他左翼背景的出版社也加入充實書肆的行列。因此晚近十年，以中文為媒介的馬共／左翼出版品似有「大量出土」的現象。一般認為，這是馬來西亞政治環境小開放的結果。無可否認，就數量言，確實有持續迅速成長之勢；就市場的銷路言，也充份反映出老左們的熱情，而這種情形一時還不會改變。但這無疑也是危機所在：如果「大量出土」的文獻僅可「內銷」，那麼很可以預見，這不是一個拓展而是正在萎縮的市場。

<sup>19</sup> 根據黨內的分期，馬共將黨史分為六個時期：戰前地下鬥爭時期（一九三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抗日戰爭時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戰後和平時期（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抗英民族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八月）；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和平民主鬥爭時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至今）。

<sup>20</sup>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戰前地下鬥爭時期（一）：建黨初期階段》（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一〇），頁iii。

左翼文獻近十年累積有成，數量確實可觀。仔細研讀文本，不難發現它們在一個可允許的範圍內相互駁斥、暗中較勁。我樂見這種歧異，它代表多元，同時也是一種內部的對話。非主流也有其「主流論述」，作為更邊緣者觀照的「中心」。因此，當更邊緣者對某一「主流」提出控訴時，對話甚至對抗便可望達成。換句話說，當其他陣營紛紛出版形式和格局雷同的文獻來頌頌以「正統」自居的馬共中央派，儘管它們都非常一致地呈現了論述破碎、文采無華的共同性，也無損其文獻價值。而更令人動容的是，即使它們當中許多是思路紊亂、時序斷裂、敘事跳躍、記憶定格的短篇，卻都是凝聚了某個人的青春和生命所譜寫成的。

誠如上述的分析，馬共在出版方面的表現非常積極，多年探索的經驗，也讓他們越發自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他們的出版能力和技巧越純熟，對文獻傳世的意義就越欠缺思慮；為了與時間競賽，也傾向量和速度的增大，而忽略論述生產的重要性。換言之，馬共及其他左翼文獻的論述性不夠，它們經常以文獻匯編為目的，而且也有政治口號化和標準化的問題。這樣的文獻雖有抗衡的動機，卻不具有抗衡的力量，跟學術研究也沒有交集。從體裁、篇幅，以及大部份文獻的敘事內容看，馬共及左翼陣營尚停留在「敘述」而非「論述」的階段，他們都太過著眼於記錄過程、描寫細節、分辨是非、咬定立場、爭奪正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彼此質問、要求交代、相互攻訐。每個陣營乃至於每個個人都在各自的立場和認識上，檢視自己的歷史傷痛，以自我為中心，沉溺在己方/個人的記憶中而不見其他人，甚至不知有其他人存在。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僅能以「小歷史」的格局出現。不過有趣的是，馬共及左翼並不認同「小歷史」敘事。

### 三、文學：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馬共書寫」出現一項重大突破，即由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紛紛出版了。事實上，馬共作家的創作多不是新著，只是受限於撰寫當時的環境而未能流通。被馬共尊稱為「人民文學家」的已故作家金枝芒所撰《抗英戰爭小說選》（二〇〇四）<sup>21</sup>、長篇《飢餓》（二〇〇八）<sup>22</sup>和《烽火牙拉頂》（二〇一一）<sup>23</sup>，就是馬共在戰鬥期間由內部印刷、傳閱的讀本。新加坡出生的賀巾是另一位重要的馬共作家，他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初發表的作品，今均收入在《賀巾小說選集》（一九九九）<sup>24</sup>，其中包含當時備受好評的《沈郁蘭同學》、《青春曲》等代表作。一九八〇年代他輾轉來到部隊，開始寫作過去在新加坡從事地下活動的故事，集結收入在《崢嶸歲月》（一九九九）<sup>25</sup>。他的長篇《巨浪》（二〇〇四）<sup>26</sup>和《流亡》（二〇一一）<sup>27</sup>則是馬共解散以後在曼谷撰寫的

21 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〇四）。

22 金枝芒，《飢餓》（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〇八）。

23 金枝芒，《烽火牙拉頂》（吉隆坡：二十一世紀，二〇一一）。

24 賀巾，《賀巾小說選集》（新加坡：新華文化，一九九九）。

25 賀巾，《崢嶸歲月》（香港：南島，一九九九）。

26 賀巾，《巨浪》（吉隆坡：朝花，二〇〇四）。

近著，分別為紀念一九五四年「五一三學運」屆滿五十週年，以及記錄本人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流亡印尼的生涯而作。

對馬華文學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馬華作家在現實主義傳統的指導下，有很鮮明的突出「此時此地」<sup>27</sup>以及「以文學述史」的寫作動機和使命。雖然創作結果未必切合歷史的軌跡，但論者不能忽視這個背景。下文將以這兩位馬共所書寫的「馬共書寫」為例，淺談他們的作品如何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相互滲透，儘管都有政治意識型態的包袱，但賀巾顯然比金枝芒更有意識地抗衡純粹的政治服務。

### (一) 金枝芒：當事人的口述歷史、宣傳與創作

金枝芒無論是其人其文，都是馬華文學中「死而復生」的殊例。金枝芒本名陳樹英，一九三〇年代到馬來亞教書，戰前就以「殷枝陽」、「乳嬰」等筆名活躍文壇，戰後更以「周容」一名掀起了「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戰。但隨著一九四八年緊急狀態的頒佈，金枝芒像在空氣中蒸發了一樣，失去蹤影。事後得知，當時他響應馬共號召參加武裝游擊戰鬥，乃名符其實的「軍中作家」，直至一九六〇年代才返回中國，加入湖南「革命之聲」電台。

《抗英戰爭小說選》收入的三篇小說所描寫的故事，從馬共的角度，都是實際發生過的事實，其中〈烽火中的牙拉頂〉所寫的更是馬共史上著名的戰役<sup>28</sup>。該書在封底及內文多處附加具體的地圖，馬共方面表現出「述史」的意圖非常強烈。編者在序中指出，來到邊區的戰士們知道「周力」（金枝芒）同志要把霹靂和吉蘭丹州戰鬥中的英雄事蹟記錄下來，大家都踴躍分享自己的戰鬥經歷和感受，

或用文字或用口述提供給作者<sup>29</sup>。曾經參與過相關戰役的戰士曾漢添，在日後回憶時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指出，一九五八年他輾轉到達邊區，在北馬局（馬共在泰馬邊境的總部）逗留的一個多月期間，向負責文宣的周同志介紹了他在丹霹兩州的戰鬥事蹟，記錄成冊後在部隊油印出版，供邊區同志閱讀<sup>30</sup>。換句話說，這些故事屬於馬共自己的、以文藝形式呈現的口述歷史採集，儘管只取其所需。

〈烽火中的牙拉頂〉以布賴（Pulai）周圍地區在日據時期及緊急狀態初期所發生的事為中心，描述這裡的人民如何支持馬共並招徠各種劫難。根據二〇〇八年的田野資料<sup>31</sup>，故事的核心人物，包括

27 一九四七年底，馬共作家金枝芒（周容）在《戰友報》發表〈談馬華文藝〉一文，與以胡愈之為首的一批南來文人掀起了一場「馬華文學獨特性」的論戰。

28 一九四八年七月，馬共的游擊隊攻陷話望生（Gua Musang）警察局，宣布「解放」該地區。但他們的勝利只維持了約五天，因英國援軍大批進駐而撤退。牙拉頂位於話望生約十公里外的地方，靠近更為人所熟知的布賴（Pulai）地區。

29 方山，〈寫在前面——悼念金枝芒老前輩逝世十六周年〉，收入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頁九。

30 這些冊子後來出版成一系列的《十年》。所謂「十年」，意即自一九四八年緊急狀態以來的十年「抗英戰爭」。見曾漢添，〈轉戰邊區〉，《漫漫林海路》（香港：見證，二〇〇三），頁一四五—一四六。

31 這部份的田野資料，由曾在此執行田野工作的陳丁輝博士（Tan Teng Phee）提供，特此致謝。見 Teng Phee Tan, "Oral History and People's Memory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60): The Case of Pulau," *Sojourn: Journal of*

眾戰士和走狗「唐嚴」的角色，都有其人，而且情節與口述採集所得相當接近。但金枝芒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其創作肩負教育、宣傳、鼓舞士氣的責任。為了達到指導和激勵戰士的功能，作者讓戰士從容就義、讓群眾慷慨犧牲、讓走狗面目猙獰、讓官兵人面獸心。這種極忠極奸的人物設計，原是革命文學中很常見的，但令人費解的是，文中對參與該戰役者，其盲從、好鬥、無紀律、形同烏合方面的描寫，似乎也無所保留，透露了馬共局部的乃至於整體的困境與侷限。

事實上在馬共的鬥爭史上，我們對這類沒有對策的戰鬥並不陌生。因此，金枝芒雖忠於現實主義教誨，卻跟他自己提出的有作用、有力量、真正服務於人民鬥爭的文藝，是「必然和『此時此地』的政治鬥爭，從配合發展到結合」<sup>32</sup>的主張結合不起來，反而與他處理女性被強暴的情節更能呼應。在他筆下，女性身受的殘害過於粗糙及粗暴，似乎是為了激怒男性，或以此激發已被激怒了的戰士／男人的戰鬥力，來達到另一種動員效果。這使作者亦自陷於「施暴者」的強勢位置，既消費了女性身體，也不具文學實質。

《飢餓》則是金枝芒名留馬華文學史的力作<sup>33</sup>。如果這部在一九六〇年只能以手抄油印、內部流通的作品沒有被重新編印出版，今天還知道它存在的，可能只剩下作者正在凋零中的昔日戰友了。《飢餓》是一部細描死亡的長篇小說，一度因為不利於士氣而停止傳閱。《飢餓》和《烽火中的牙拉頂》一樣是口述資料採集的成果，但令人意外的是，《飢餓》的架構、筆觸或文字，遠比《烽火中的牙拉頂》成熟、流暢、有說服力，使其文學性很稀罕地凌駕於歷史和宣傳的意義。在小說中，金枝芒為了讓一支由十五人（包括一名初生嬰兒）組成的小隊最後犧牲剩下五人，花了四百多頁的篇幅利用

長達至少七至八個月的時間把他們一一致死。作者似乎是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關於覓食的危機和在飢餓中掙扎瀕死的面貌全都寫進了一部小說裡，所以受難者必須一個一個接續死亡，而不是更接近事實的集體餓斃。我們雖然不知道作者捨棄常見的以「歷史事件」為藍本的創作手法，改採文學性更濃厚的死亡描寫的動機，但他筆下所記錄的死亡案例似都有所根據，是口述歷史，也是戰友們親身經歷的磨難和考驗<sup>34</sup>，雖然不無選擇性書寫。這是文學與歷史互為滲透的一種表現。即使死亡本身不是事件只是細節，但《飢餓》的死亡情節實在太過具體、太過詳盡，也太過深刻了。金枝芒如此竭力盡職地記錄死亡，已相當於把一場進行中的革命歷史凝固在創作之中。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 27 (2012): 84-119。

32 周容，〈論馬華文藝〉，《戰友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收入朱齊英編，《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料選輯（上、下）》（吉隆坡：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二〇〇九），頁一六〇—一六六。

33 黃錦樹認為《飢餓》的文學筆觸超越了宣傳。莊華興則暗示《飢餓》可以填補經典缺席的空洞。見黃錦樹，〈最後的戰役——論金枝芒的《飢餓》〉，頁七〇—七七；莊華興，〈從失蹤到失憶——以郁達夫和金枝芒為例探討馬華文學的存在之議〉，宣讀於「歷史與記憶——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二〇〇七年一月四—六日）。

34 曾漢添的文章和《飢餓》的情節有很多「似曾相識」之處，文中他也提到曾向金枝芒口述了艱難的雨林戰鬥生活。見曾漢添，〈轉戰邊區〉，頁九二—一五五；另一方面，筆者在田野中收集到父母親手殺嬰的故事。

## (二) 賀巾：當事人，新加坡的左翼經驗

相較於金枝芒被奉為「人民文學家」的地位，賀巾在馬共內部卻未得到特別的推崇。事實上賀巾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就是馬華文壇頗負盛名的左翼作家，其作品〈青春曲〉和〈沈郁蘭同學〉（以「韋嘉」為筆名）均描寫中學生參與活動的情形，前者近似中國左翼文學中的「成長小說」，在當時很受歡迎。賀巾本名林金泉，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創作的題材自然也圍繞著生活和地方經驗，因此我們讀到有別於其他描寫武裝戰鬥的「馬共書寫」，因為新加坡的左翼活動有其環境侷限，沒有武裝的條件，但工運和學運卻異常活躍。

賀巾的創作即反映了這樣的新加坡經驗。他的作品，不論是早期從事地下活動的階段或晚近重返社會以後，即使是一九八〇年代在部隊期間，也都洋溢著青春的氣息。他筆下的人物多是來自不同階層的學生和工人，他們熱情、羞澀、幼稚、情竇初開，對人生的價值感到困惑，對社會國家的前途感到憂心，學習成熟又不失莽撞，經常在懵懂中萌生愛情，復在理想之下受阻，或彌堅。這些青澀知性的男女學生的人格特質，在彼此間互相影響，同時也啟蒙他人。

《巨浪》的故事描寫一九五〇年代新加坡的華校生，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影響下，發起反對「民眾服務法令」(National Service Act)<sup>35</sup>、「反黃運動」<sup>36</sup>以及反殖鬥爭的故事。作者清楚表明人物純屬虛構，且為了不拘泥於歷史事實而再三修改。話雖如此，小說並沒有脫離歷史的情境和脈絡，仍按照現實主義文藝的條件進行創作。《巨浪》之前的作品集《崢嶸歲月》裡收入的多篇小說，都是悼念亡友而作，自承近乎紀實。同書名的〈崢嶸歲月〉一文更是「具有統括我們這一代人的含意」，而其中

人物，「都還健在」<sup>37</sup>。〈崢嶸歲月〉描寫的是當年參加學運的伙伴們，經過將近四十年後重聚，回顧人生也慨嘆時代的故事。這些在故事中「都還健在」的人物，全部又出現在《巨浪》裡了。賀巾希望讀者不要對號入座，所以特別澄清，卻徒勞無功，因為問題不在「虛構」而在「寫實」，即使對反面人物的描述也竭盡「寫實」的責任。賀巾創作可以用一個「實」字道盡——他遵循「寫實」主義、創作「紀實」文學，也尊重「史實」根據。他不是沒有掙扎過，對黨內的批評，他肯定也有所覺察，但

35 一九五四年，殖民政府頒佈「國民服役法令」，規定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出生的十八至三十歲男性需登記入伍。此舉引起華社反彈，華校生（特別是超齡生）以求學為由要求免役，於五月十三日前往總督府請願，結果與警方爆發衝突，造成四十八名學生被捕，約五十至六十人受傷，是為「五一三事件」。是夜，超過千名學生集合在中正中學，抗議政府對學生施暴。經中華總商會居中協調，學生獲釋，而總商會也限於壓力，宣佈提前放假以解散學生。但學生於六月二日重返校園展開另一波集中，直到教育部恫言關閉學校，整個反對運動才於六月二十四日宣告結束。詳見：陳仁貴等編，《情繫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吉隆坡：資訊策略研究中心，二〇一一年。Jing Quee Tan etc. ed., *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 (Petaling Jaya: SIRK, 2011)。

36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十六歲的女學生莊玉珍在珍珠山 (Pearl Hill) 距離警察局不遠的地方遇害。這宗姦殺案震驚新加坡社會，華校生組織起來將原來已經存在的「反黃」呼聲推向高潮。「反黃運動」的主旨為打擊「黃色文化」，反對美日電影、色情書報、歌台表演、脫衣舞團等麻醉和荼毒群眾的「黃色文化」的產物。

37 賀巾，〈前言〉，《崢嶸歲月》，頁一〇。

他堅信：「這是史實，總得面對！」<sup>38</sup>

賀巾的另一部長篇《流亡》可以說是《巨浪》的續篇，故事描寫兩名青年學生經過一九五〇年代的運動浪潮後，因相知相愛而結合，並在一九六〇年代新加坡地下環境越發惡劣之際，經由組織安排，輾轉偷渡到印尼，從此展開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他們在印尼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在蘇門答臘沿岸城鎮、海島教書，留意海上活動，試圖開通偷渡到馬來西亞的路線。

日子過得很平靜，他們苦候組織的消息，但組織似乎已遺忘了他們。如果不再堅持，便可以過上尋常人家的生活，但他們卻沒有放棄尋找組織。終於他們跟組織聯繫上了，調派回雅加達，隨行還有三名子女。這是黨與家的分水嶺，因為要革命得先「破家」。一家五口開始過著集體生活，雖同住一屋簷下，但孩子「歸公」，由組織派員教養，並改稱父母為「叔叔」、「阿姨」。大人們也陸續面對一波接一波的整風。

賀巾以自己 and 妻子為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小說中的許多其他人物的身份也呼之欲出。《流亡》跟《巨浪》一樣，充分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文藝路線，其寫實程度甚至造成部份黨內人士對他有所微詞，認為他好發牢騷，把個人的委屈轉移到作品中，人物刻劃頗有針對性，有投射對象，特別是將全體的缺失集中在某角色人物身上，擴大其負面形象。內部的批判必然有其「根據」，但有意思的是，這種駁斥不但無損於作品的「寫實」價值，反而更說明了某種「實況」。歷史與文學交纏的趣味，於焉現形。

### 小結：馬共歷史，有意義的文本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大歷史」的既定框架和期待下，馬共作為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可能性被壓縮或被排除了。當然，這不是馬共單方面的問題，學界對馬共歷史的關心也集中在政治相關課題。某種對「大歷史」的傾斜和執迷，使得馬共未能著眼於微，兼容「小歷史」的視野。然而弔詭的是，馬共一方面追求「大歷史」書寫，本身卻更多地生產「小歷史」文獻——他們面對極其嚴重的論述瓶頸，在很大程度上處於形而下的「敘述」層次。

事實上在我看來，任何文獻都是有意義的本文，包括剪貼成拼布般的文集資料，以及將個人的生命經歷夾纏在文字中的文學創作。正因為其論述能力不足，馬共的焦慮才一目了然，真實得無法掩蓋。這讓我更加確認，「大寫」的政治史框架沒有辦法應付歷史的實際狀況，馬共的面貌顯然比政治視野所可以包含的範圍更宏大更複雜。然而「大歷史」排擠了其他歷史主體（如女性、基層、地下成員、一般戰士、民運、群眾等）和主題（如性別實踐、區域差異、社會生活、庶民記憶、森林作戰、飲食與求生技術等）的介入，而這些主體和主題恰恰是組合一幅馬共歷史拼圖的必要條件。

馬共對歷史學者寄於厚望，頻頻表示馬共與其他左翼文獻的彙編及出版，乃為學術鋪墊，呼籲學者為他們走過的足跡作出公允的評論和總結。然而，馬共及廣大的左翼陣營其實還沒有準備好開誠面

38 賀巾，〈前言〉，《崢嶸歲月》，頁一三。

對歷史，因為他們對歷史學者的期望並非無條件開放的。相反的，他們執著於各自的框架，不接受自我設定以外的結論——「別人」的結論。然而左派本身也沒有「自己」的共識，因為他們根本不是一個整體，並且彼此看不見他人的存在。

這一直是問題的癥結，如果馬共及左翼陣營未能意識到這一點，更具開放性，這種情況延宕愈久，恐怕愈不利於在這場反殖建國鬥爭中爭取到應有的歷史位置和應得的歷史結論。我以「馬共作為性別史」的視野來探索另一種可能性，讓更多個體被納入論述的框架，讓更多面貌被包含在內，是一個新的嘗試。而黃錦樹老師則另闢一條文學的路徑，用他獨特的幽默、一貫的自我、攔也攔不住的「頑劣」、有文獻基礎的背景、真假難辨的佈局、天馬行空的奇想，把他對「馬共」的想像轉化為一則又一則的故事。我作為馬共歷史研究者，每讀他的小說，對他這種「無法無天」的「惡搞」很是不安。他邀我供稿時，我猶豫了一下，但簡短的對話後，我便答應。其實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想借文學把馬共整個帶進馬華文學史，讓它變得不可忽略。」

我們談到「閱讀馬共」。我和錦樹老師有不同的閱讀方式，我讀是有畫面的，有一張張戰士的臉，而他讀僅限於文字，戰士也只是文本。歷史學者和小說家雖不相同，但想要把各自的「馬共」放進專業領域的企圖與議程卻是一致的。

黃錦樹燒芭是出了名的，請您放輕鬆，一笑置之。

潘婉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畢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著有《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

本文根據作者進行中的博士論文及以下兩篇已發表文章剪裁、修訂而成，特此註明：〈馬來亞共產黨史的生產與問題〉，《人間思想》夏季號第一期（二〇一二年八月），頁一五五—六九；〈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收入徐秀慧等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台北：里仁，二〇一一），頁四三九—七六。